第一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物价概况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直接统治地区内的物价是一种扶摇直上、日益上涨的趋势。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物价水平还是基本稳定的。战争初期的 1937 年至 1939 年，物价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上涨幅度不大； 1940 年至 1941 年，随着大片国土的相继沦陷，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对外贸易渠道多被阻断，工农业产品供不应求，税收锐减，军费猛增，财政赤字加大，纸币投放过多，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物价随之大幅度上涨；到 1942 至 1945 年，物价狂涨到最高程度，较之抗战初期，物价水平上涨了百倍以上。

第一节　抗日战争前夕的经济形势与物价

自 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至 1937 年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已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期间，由于各派军阀之间的内战，以及国民党政权对中国红军的五次“围剿”，在农村中大肆征兵拉夫，宰杀耕畜，摊派苛捐杂税，再加上水旱灾害，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在工业、交通、贸易、金融等方面，帝国主义各国的投资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们垄断着旧中国的铁路、内河航运、航空、钢铁、煤炭、发电、纺织等各个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门，掌握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同时中国的官僚资本也逐步地发展起来，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力下，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是举步维艰。尽管如此，为了巩固本身的统治，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是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尽可能地促进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至 1936 年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各个部门的发展都达到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水平，物价也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

一　农业发展的情况

20 年代至 30 年代的初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首先是遭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很多地区的农民向地主交租份额占其农产品收获量的一半以上，有的地方地租竟占全部收成的 70％到 80％，贫苦农民生活没有保障，不得不借贷度日，又要忍受高利贷者的盘剥。其次是天灾人祸的骚扰，当时的东北、华北、华中和华东的部分省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再加上 20 年代军阀之间的多次混战，30 年代初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中国红军的五次“围剿”，反动军队和基层政权在农村中任意征兵拉夫，征税征粮，除正税之外，还有多种附加税，捐税逐年成倍地增长，遭受战火破坏的同时，农民还要负担大量的军费开支。天灾人祸迫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农村中劳动力与耕地日益减少，土地荒芜，农村经济衰微破败，农业生产下降，粮食经常歉收，所产粮食自给不足。帝国主义国家趁此机会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它们以大量生产过剩的农产品向中国廉价倾销，垄断中国粮食市场，我国沿海大中城市居民多依赖进口的洋米、洋面，农民生产的粮食在价格上不能与之进行竞争，形成“谷贱伤农”的局面，即使遇到丰收年景，农民也是增产不增收，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凋零，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基础，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促进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 30 年代初期通过制订有关法令对农民交纳地租的数量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在 1934 年召开的全国第二次财政会议上，废除了各种田赋附加税，并提高了外国粮食进口的关税；在全国农村组织成立大量的农业信贷合作社，银行通过农业信贷合作社给农村提供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发展生产的资金困难；在农村推广水稻、小麦和玉米等良种；指导农民使用农药和肥田粉，即化肥；进口农用机械和部件，等等①. 由于采取了种种措施，农业生产得到了缓慢的发展，到抗战前夕的 1936 年，农业总产值为法币 199.23 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5%②.

二　工业发展的情况

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从 19 世纪末才开始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到 20 世纪初期的 1914 年至 1918 年，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暂时无暇顾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工业在这期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历史上被称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直到战后的 20 年代，民族工业仍有较大的发展。民族工业投资发展的主要部门是棉纺织业和面粉加工业部门，其他如卷烟业、火柴业、缫丝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等部门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民族工业发展的部门大多属于轻工业部门，发展的地区主要在于沿海大中城市，如上海、天津、无锡、南通、青岛、济南、石家庄等地，内地中西部城市如汉口、武昌、重庆、成都等地民族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的不完全统计，1914 年全国共有资本较大的厂

① 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第 100 页。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 127—133 页。

矿公司 146 家，资本总额共计为 4100 万元。到 1922 年，厂矿公司增加到 379 家，资本总额共计为 16000 万元。公司数增加了 1.5 倍，资本总额增长了将近 3 倍，平均每家资本额由 28 万元增至 43 万元。这说明不仅厂矿公司的数量有明显的增加，而且投资规模也比以前扩大了①。然而好景不长，在 1922 年于华盛顿召开的九国会议之后，战争危机已经过去，以日、美、英为主的各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回到了中国。他们一方面向中国输出大量的商品，另一方面又在中国投资办厂，并不断吞并华资企业，再加上 20 年代各派军阀之间的连年混战，遂使民族工商业逐步衰落下来。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于 1928 年开始，逐渐实现了关税自主，提高了进口税率，降低了出口税率，进行了税制改革，裁撤厘金，实行统一税，提倡国货等等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1928 年至 1931 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又出现了新的繁荣。在这几年间，中国新建立的厂矿企业有 662 家，资本总额 25245 万元，平均每年新设厂矿 220 多家，新投资本 8415 万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②。

在这期间从 1929 年至 1933 年在资本主义各国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长达 4 年之久，是工业、农业、金融和信用各个部门的全面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锐减，工农业产品充斥市场，价格狂跌。为了转嫁其经济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低价倾销生产过剩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产品，中国工业品无力与之竞争，民族工业受到很大冲击，自 1932 年至 1935 年又走向低潮。在此同时，帝国主义各国还向中国输出大量过剩资本，在华投资办厂，修筑铁路，采煤炼铁，完全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到 1936 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达到 42.8 亿美元，

①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4辑，第 21页。
②董长芝、李帆：《中国现代经济史》，第 76页。

其中日本有 20 亿美元，英国有 10 亿多美元，美国有 3.4 亿美元[①]。在帝国主义各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冲击之下，中国市场上商品销售困难，物价下跌，工厂不得不停工减产。直到 1935 年 11 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改用法币以后，由于流通中货币增多，物价上升，经济又逐渐恢复，至 1936 年和 1937 年上半年又走向繁荣。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的统计，到 1937 年抗日战争前夕，除东北已被日本占领外，全国共有工厂 3935 家，资本总额共计 377857742 元，平均每家资本为 96024 元[②]。从 20 年代初到 1937 年，工厂的数量增加到 10 倍以上，而资本总额只增加了 1 倍多，这说明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内，民族工业中的中小资本增加了很多。从 1927 年至 1936 年各主要工业部门生产增长的情况如下：煤，1927 年为 14.2 百万公吨，1936 年增至 26.2 百万公吨，平均每年增长 7.0%；电，1927 年为 772 百万千瓦，1936 年增至 1724 百万千瓦，平均每年增长 9.4%；水泥，1927 年为 498 千公吨，1936 年增至 1243 千公吨，平均每年增长 9.6%；棉布，1927 年为 8999 千匹，1936 年增至 35448 千匹，平均每年增长 16.5%[③]。到 1936 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约为法币 306.12 亿元，其中工矿业总产值为 106.89 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35%[④]。

三　交通发展的情况

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的不断投资或贷款，也得到一定的发展。在铁路运输方面，从 1932 年至 1937 年

①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 45 页。
② 黄东绶：《五十年来之中国工矿业》，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文海出版社 1948 年版，第 173 页。
③ 〔美〕阿·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49—451 页。
④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 127—133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几年中，发展更为迅速，平均每年修建铁路 1132.88 公里。1927 年，中国只有铁路 13040 公里，1928 年至 1931 年，增建铁路1198 公里，平均每年修建 299 公里。1932 年至 1937 年又增建 6797 公里，到 1937 年，全国共有铁路 21036 公里①。在 1929 年，国民政府组建了道路修建委员会，以加速公路的修建。到 1936 年底，全国公路已有 69000 公里②。中国轮船吨位在 1927 年只有 291 千吨，到 1935 年增加到 678 千吨。航空业在 1929 年只飞行 96 千公里，到 1936 年则增加到 3460 千公里③。

四　金融和财政税收情况

从 1927 年到 1936 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的金融事业也有较快的发展。中国的银行在 1928 年只有 58 家，到 1936 年就发展为包括四行在内的总行 164 家，并设有分行 1332 家④. 全国银行存款的总额在 1931 年底为 20.73 亿元，到 1937 年就增长到 39.58 亿元⑤。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在增长。在每年的收入中，税收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而在税收中，关税、盐税和统税这三大税源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从 1928 年开始，连续 9年中三大税源都占税项收入总额的 90% 以上。1936 年关税收入为 6.359 亿元，盐税收入为 2.474 亿元，统税收入为 1.313 亿元，三大税源收入合计占税项收入总额的 95.9%。1927 年税项收入总额只有 0.465 亿元，到 1936 年则增长为 10.573 亿元。除税项收入外，还有其他收入 2.36 亿元；把借款收入除外，

①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80 页。
② 〔美〕阿·恩·杨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58 页。
③ 同②书，第 449—450 页。
④ 杨荫溥：《五十年来之中国银行业》，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896—1947)，文海出版社 1948 年版，第 41、42、51 页。
⑤ 同上。

1936 年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共计为 12.933 亿元，这是抗日战争以前中国财政收入达到的最高水平。如以 1927 年为基数，1936 年的指数为 1673，1936 年的财政收入比 1927 年增长了 15 倍[①]. 尽管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断膨胀，并连年出现赤字，如在 1936 年财政支出即达 18.94 亿元，财政赤字高达 6 亿元[②]，但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经过逐年的发展，在 1936 年至 1937 年上半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都达到战前的最佳状态，市场上供求情况相对平衡，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以当时工商业最发达的大城市上海为代表，以 1926 年为基期，到 1936 年上海市的物价指数为 108.5，10 年中上涨了 8.5%，从 1936 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幅度来看，平均每年上涨不到 1%[③]，而其他地区在同期内的物价上涨幅度都低于上海。如以 1937 年上半年为基期，则 1937 年 7 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 103，其中食物类指数为 99，衣着类指数为 106，燃料类指数为 100[④]。这说明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和战争刚刚开始时，全国物价上涨的幅度还是不高的。

第二节　抗日战争初期的物价波动

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的战火在事实上宣布了抗日战争的开始，虽然到 1941 年 12 月 8 日中国的国民政府才追随英、美之后向日本正式宣战。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在 1937 年 7 月 30 日，天津、北京相继沦陷于敌手；接着于同年 11 月上海失守，12 月南京、济南相继陷落； 1938 年 1 月日军占领青岛；同年 5

①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5、43 页。
② 同上。
③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1 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印《全国物价指数表和各城市物价指数表》，国民政府主计处档案，六，4749。

月徐州、合肥又被日军占领； 6 月安庆陷落；7 月九江失守；到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昌、汉口、汉阳相继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我国西部地区即西南和西北的 10 多个省、市，成为支持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此后，日寇为进一步切断中国的对外交通，封锁中国内地，就在 1939 年，又在华南地区发动新的攻势。日军于 1939 年 2 月占领海南岛；3 月攻占南昌；6 月占领汕头和潮州；同年 8 月攻占深圳，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南部的对外交通，阻断中国和印度支那之间的运输联系。 1939 年 9 月，欧洲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成为世界人民反汉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抗衡，而且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它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持。前方大量的军需物资要靠后方供给，而且后方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也必须得到满足。然而，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在短短的时间内，我国东部、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沿岸大城市都相继沦陷，在经济上遭到巨大损失。过去中国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都在东部沿海一带，东部地区沦陷后，到 1938 年底，日本已占有中国 1/3 的土地，农业生产的 40%，工业生产能力的 92%①。日军不仅割断了沿海城市和内地的联系，而且割断了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的渠道；同时有沿海地区的部分工厂迁到内地，它们要恢复生产，还有大量人民从沿海地区逃到大后方，因而军需和民用的需求增加，能够进入大后方的商品供应却在减少。大片地区的沦陷使税收锐减，而财政支出却与日俱增，造成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内迁的工厂恢复生产需要资本，开发内地资源，发展工矿产业更需要大量的投资，这便引起银行业的信贷膨胀。财政收入加上借债都不足以支付如此庞大的开支，最后就只有靠发行钞票来弥补财力的不足，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

①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 页。

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促使物价持续地上涨。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有一些因素对于物价的上涨发生了某些抑制作用，因而抗战初期物价总水平的上涨还不是十分严重，同抗日战争中后期的物价水平相比，还算是相对稳定的。

一　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

1. 工业品的供给减少而需求增加，市场上供求不平衡，工业品带动整个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中国失掉了全国总生产量的一半以上，大后方工业品的供应减少，进口的工业品更为紧缺，价格突飞猛涨。1938 年 10 月广州沦陷后，进口商品价格猛涨了 72%[①]。当时内迁的许多工厂要筹备恢复生产，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并重”的方针下要开发内地资源，进行工矿业和交通建设，因而市场上对投资品和建筑材料的需求迅速增长，促使这些产品和五金、电器、化学产品等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同时沿海地区人民大量逃往内地，从而对生活消费品的需求也急剧增加，所有这些都推动物价上涨。

2. 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存在高额赤字，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弥补亏空。国民政府为了开发内地的资源，发展内地的工业和交通，就必须进行投资，于是财政支出扩大，1939 年比起 1937 年财政支出增加了 33%。与此同时，由于华东地区的沦陷，丧失了税收的主要来源，财政收入大大减少。1939 年的收入比战前减少了 63%，当年财政赤字达 20.57 亿元法币[②]。由于人民认购公债的热情不高，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又消耗殆尽，而不得不依靠发行新钞来弥补财政收支的差额，到 1938 年的下半年，法币的流通量增加了 148%，已达 25.6 亿元[③]，这势必造成一定

①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 2 页。
②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 3 页。
③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 4 页、第 5 页。

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3. 银行信贷扩张进一步助长了通货膨胀。在内地发展工业、农业、矿业等缺少资金，国家银行不得不提供贷款。1939 年国民政府采取了鼓励向私营企业扩张信贷的方针，于是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便急剧增加。1937 年国家银行向私营工商业贷款的总额为 14.71 亿元，到 1939 年就达到 25.78 亿元[①]。这对内地工商业的发展确实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不久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就超过了银行吸收的存款，同时国家银行为政府支付的垫款也急剧增加，使银行信贷的差额不断扩大，这也只有靠发行钞票来抵补。所以，银行信贷扩张进一步助长了通货膨胀，加剧了物价的上涨。

二　抑制物价上涨的因素

1. 抗战初期农业丰收，农产品供应充足。抗日战争初期，武昌、汉口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华东沦陷后许多人民也逃往四川。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1938 年和 1939 年又喜获丰收，遂使大后方粮食供应充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有保证，这在较大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所编之全国物价指数表，以 1937 年上半年为 100，当年 12 月粮食批发价指数为 89，比战前降低了 11%；零售价指数为 90，比战前降低了 10%。可见，由于粮食丰收，主要农产品降价，对于抑制或延缓物价的上涨，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抗日战争初期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工业品尤其是其中的投资品如建筑材料和各种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所引起的。

2. 一部分内迁的物资和进口的商品暂时缓和了市场上供与求之间的矛盾。在东部沿海城市沦陷之后，虽然工业品的供应迅

①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 4 页、第 5 页。

速减少，然而随着一部分工商企业、政府机关、各种学校以及人民群众的内迁，大多携带了一些备用物资与各种商品。此外，尽管日军企图割断内地与沿海之间的联系，阻断国内与国外的交通运输，但是在抗战初期，海上通道受阻，西南还有滇越铁路和新建的滇缅公路，可以从国外输入部分工业产品和重要物资；国内有西北和西南的公路交通网，由川陕公路连接，以成都为中心，可与外省进行物资交流，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上商品供求之间的矛盾，抑制了物价的上涨。

3. 大后方人民群众实际收入降低，购买力受到局限。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随着战局的发展，大后方工业品供应紧张，并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物价逐步上涨。但是广大工薪阶层的工资或薪水收入并未有所增长，因而劳动者的实际收入降低，消费水平有所下降。据统计，以1937年的实际工资为100，到1939年，重庆市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指数为47，教师为64，一般服务人员为64，工业工人为[illegible]，只有一般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略有提高①　这种情况说明广大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受到一定的局限。再加之西部地区各省多种农牧业地区，自然经济的比重较大，因而对市场形成的需求较小，这也对市场物价的急剧上涨构成一定的抑制作用。

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作用，抗日战争初期大后方物价水平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上涨的幅度还不是很大，这是同抗战后期相比而言的。1937年至1939年全国批发和零售物价指数如表1—1、表1—2、表1—3所示。

①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43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表 1—1　全国批发物价指数①

基期：1937 年上半年为 100

时　期	总指数	食物类	衣着类	燃料类	金属类	建筑材料类	杂项类
1937 年	103	100	107	103	109	104	102
1938 年	131	108	160	131	162	141	164
1939 年	220	163	308	234	305	227	240

表 1—2　全国零售物价指数②

基期：1937 年上半年为 100

时　期	总指数	食物类	衣着类	燃料类	杂项类
1937 年	103	101	107	105	103
1938 年	130	115	156	138	140
1939 年	213	175	295	220	243

表 1—3　1937 年至 1939 年重庆市批发与零售物价指数③

基期：1937 年上半年为 100

	批发物价指数				零售物价指数			
时期	总指数	食物类	衣着类	燃料类	总指数	食物类	衣着类	燃料类
1937 年	101	97	108	103	102	101	108	108
1938 年	126	89	181	148	122	100	163	160
1939 年	220	122	462	310	203	140	386	300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主计处档案〔（六）　4749〕》。
② 资料来源：同表 1—1。
③ 资料来源：同表 1—1。

第三节　抗日战争中期的物价上涨

在战争初期，大后方物价上涨的幅度不是很大。这是由于农业丰收，农产品的供应较为充足，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缓慢，这不但对整个物价总水平起了相对稳定的作用，而且对于当时的整个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都有一定的稳定作用。到了 1940 年和 1941 年之际，情况却迥然不同。由于农业连年歉收，战局发展，商品进口更加困难；再加上政府开支急剧增加，入不敷出，银行信贷继续扩张，货币发行过量，导致通货膨胀日趋严重，物价大幅度上涨。这一时期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　市场供求关系紧张，商品供不应求

1940 年和 1941 年连续两年大后方的农业歉收，市场上基本生活必需品粮食的供给不足，这是导致物价不能保持稳定的基本因素之一。1940 年大后方 15 个省的稻谷收获量较常年减产 20％，全年农产品总产量比常年减产 10％；到 1941 年粮食产量继续下降，比战前平均降低了 9％至 13％。

1940 年农业上的突然减产，使农产品不但不能如战争初期那样，对价格的上涨起制约作用，反而推动了食品的价格突飞猛涨。各省城镇的黑市生意也活跃起来，使粮食价格大大超过各地的行业公会和政府机构所规定的平价。如全国粮食零售物价指数，以 1937 年上半年为 100，1940 年 1 月为 202，同年 12 月就达到 608；到 1941 年 12 月就涨到 1797。再如重庆市粮食零售价格指数，仍以 1937 年上半年为 100，1939 年为 112，1940 年为 378，到 1941 年就达到 1730。成都市粮食零售价格指数还要高一些，基期相同，1939 年为 112，1940 年为 390，到 1941 年就

上涨到 1925[①]。

1939 年 11 月日军占领南宁，阻断了中国与越南之间的运输线，同时又迫使法国停止利用滇越铁路向中国运送商品；1940 年 7 月迫使英国停止开放滇缅公路，至此中国从国外进口商品就更为困难，1941 年，由国外输入内地的物资只及 1939 年的 1/3。再加上日军封锁长江，铁路大多陷入敌手，日军飞机的轰炸，交通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市场上商品供应愈趋紧张，这种情况促使物价迅速上涨。

二　财政收入不敷支出，赤字增长

1940 年，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征兵运动，三年内每年征兵 50 万人，在各省修建军事基地，运输军需物资，大大增加了政府的开支，并使消费品的供应更加紧张。征兵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对于农业减产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从 1939 年到 1941 年，政府总支出增长了 3.5 倍以上，其中军费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 73%。政府收入远远不能支付政府的支出；1941 年，政府收入仅占政府支出的 13%。当年政府支出为 100.03 亿元，政府收入为 13.10 亿元，赤字达 86.93 亿元，这些赤字只有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到 1941 年 12 月，钞票发行额达到法币 151.00 亿元，从而使批发物价比 1939 年 12 月上涨了 6 倍[②]。

三　流通过程中的投机活动

货币的过量发行加重了通货膨胀，推动物价加速上涨。物价高涨进一步加大了政府的开支，最终使财政赤字扩大，又给货币发行带来新的压力，这种趋势逐步形成恶性循环。除了政府对于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印：《全国物价指数表及各城市物价指数表》，国民政府主计处档案，六，4749。

②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 19、20、22 页。

货币的过量需要外，在流通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投机活动。面对飞涨的物价，投机者纷纷囤积工业原料以及其他各种投资品，企图转手倒卖，牟取暴利；而一般群众则储存粮食和其他消费品，因为货币迅速贬值，群众就把手中货币换成实物以保存价值。流通中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种种活动，扰乱着流通秩序，增大了市场上的需求压力，促进了供求的矛盾，使市场上的商品可供量更为减少，这种情况也推动了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1940 年至 1941 年全国批发和零售物价指数如下：

表 1—4　全国批发物价指数①

基期：1937 年上半年为 100

时期	总指数	食物类	衣着类	燃料类	金属类	建筑材料类	杂项类
1940 年	513	406	763	629	732	453	486
1941 年	1296	1170	1727	1374	1844	1108	1152

表 1—5　全国零售物价指数②

基期：1937 年上半年为 100

时　期	总指数	食物类	衣着类	燃料类	杂项类
1940 年	503	416	725	538	532
1941 年	1294	1168	1718	1241	1249

表 1—6　同期重庆市批发与零售物价指数③

基期：1937 年上半年为 100

批发物价指数					零售物价指数			
时期	总指数	食物类	衣着类	燃料类	总指数	食物类	衣着类	燃料类
1940 年	559	360	1154	1024	548	355	1000	942
1941 年	1578	1472	2003	2300	1467	1368	1843	2144

① 资料来源：同表 1—1。
② 资料来源：同表 1—1。
③ 资料来源：同表 1—1。

第四节　抗日战争后期的物价狂涨

自 1942 年至 1945 年的几年中，是大后方物价上涨得最快和物价水平上升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在这期间物资的供应更为紧张，政府的开支更大，因而财政赤字也更快地增长。银行信贷不仅更加扩张，而且参与了投机活动；货币过量发行，很快贬值，人民对法币失去信心，外汇价格也在猛涨。具体情况如下：

一　市场上工农业产品供求关系更为严峻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不久，就占领了香港，使中国丧失了最后一条从海上进口商品的渠道。1942 年 5 月日军又进攻云南，切断了滇缅公路，完成了对中国的包围。这对中国的经济又是一个严重的打击，1942 年商品进口额比 1941 年减少了大约 50％，引起物价加速上涨，进口商品价格在 1942 年上涨了三倍以上。到 1944 年，进口商品量比 1941 年减少了 78％左右[①]。从 1942 年滇缅公路被割断后，大后方对工业品的需要主要靠当地工业生产来满足。1943 年因原料缺乏很多工厂停产，到 1944 年工业生产普遍下降，消费品的生产指数下降了 9％，引起国内产品价格的突飞猛涨。

农产品的供应由于 1942 年和 1943 年的粮食收成不佳，再加上政府于 1941 年 6 月开始实行的田赋征实和后来的粮食征购，使自由市场上的粮食供应减少，经常发生供不应求，促使价格上涨。直到 1944 年粮食生产获得了丰收，情况才有所缓解。

①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7 页

二　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赤字扩大

1940 年和 1941 年由于大规模征兵造成的过度开支之后，在 1942 年和 1943 年，因日军把主要兵力用去对付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稍为缓和。 1944 年日军又对华中地区发动进攻，政府的支出大量增加。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 1944 年为 51％，到 1945 年增加到 69％[①]。

除军费支出外，行政开支也在大量增加。为了控制商品价格并实施各种统制措施，增设了许多机构和文职人员，并且调整了公务员的工资，以致政府的总支出直到战争结束时都是直线式上升。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增加税收，仍然是入不敷出，财政赤字连年增长。1942 年的财政赤字为 188.81 亿元；1943 年为 384.13 亿元；1944 年增长到 1331.86 亿元；1945 年竟达到 11066.96 亿元[②]。这就为通货膨胀增加了推动力。

三　银行信贷继续扩张，货币发行过量

从 1940 年政府即对银行信贷业务进行管制， 1943 年又明令对于银行贷款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然而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仍在不断增加，私营银行则在从事大量的投机活动。随着物价的飞涨，国家银行也和私营银行一起把资金用于投机倒把活动。在贷款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部分资金流入黑市，黑市利息飞快上升，1945 年 8 月，重庆市场上月息达到 10％，在战前月息仅为 1％。

几年中，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不断增加，其数额之大，竟把所增加的存款完全用光，国家银行给政府的垫款只有靠增发新钞票来支付。1945 年的钞票发行额达到 103.19 亿元。与

①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 29 页。
②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 30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